

陈正夫◎著

陈正夫

自选集

陈正夫

自选集

陈正夫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正夫自选集/陈正夫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671-579-7

I. 陈… II. 陈… III. ①哲学史—中国—文集
②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3725 号

陈正夫自选集

陈正夫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361004)

人民日报社福州印务中心印刷

(福州市鼓屏路 33 号 邮编：350001 电话：87556835)

开本 850×1168 1/32 21.875 印张 2 插页 545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1-579-7
I · 91 定价：46.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陈正夫，男，1931年9月生，海南省文昌市人，1951年参加工作，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通史研究生班，1958—2001年在江西大学（南昌大学）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历任江西大学副教授、教授，哲学系系主任兼应用哲学研究所所长，江西—ESEC中美特殊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曾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江西省哲学学会理事长、江西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等多项社会兼职，出版专著四部，出版主编书二部，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约100篇。其学术研究成果获得江西省颁发的优秀社会科学成果甲等奖一项、二等奖六项。是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享受者。

前　　言

这个集子是我从发表的约一百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五十一篇文章。从1963年5月24日我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我的处女作《王安石自然观初探》起，至2005年9月为参加国际王阳明学术研讨会而寄的一篇文章，总共经历了四十二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敏感性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自然也不断发生变化。为了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这个集子所收集的文章，我不作任何改动，好让读者从中了解这段时间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脉搏和轨迹。本集收集的基本上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文化哲学研究》和《论人的价值》两篇文章，虽然不完全是中国哲学，但它的提出和探讨同中国哲学有密切关系，有些内容实际上是中国哲学的问题，所以也收集在这个集子中。

这个集子涵盖着四十余年的学术活动，从现在的角度看，缺点和不足之处是难免的，请读者不吝指正。

陈正夫

2006年4月

目 录

论孔子的思想核心——“仁学”——人学	(1)
老子“道”的宇宙论及其历史作用	(12)
《周易》与中国哲学	(21)
孔子的人学思想与中国现代化	(27)
孔子教育思想研究	(41)
论孔子及历史上对孔子与孔子思想的改造	(57)
孔子的历史地位与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70)
孔子的和合思想与21世纪的和合精神	(91)
论儒家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103)
论儒学与中国的发展	(127)
儒学与我国未来文化	(145)
儒学与现代化	(162)
王安石哲学思想研究	(174)
论王安石的“荆公新学”	(209)
朱熹哲学思想研究	(224)
朱熹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和逻辑结构	(246)
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	(262)
朱熹理学与佛教哲学	(279)
程朱理学与封建专制主义	(289)
试论程朱理学的特点、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301)
朱熹与传统文化	(314)
朱熹与中国教育	(323)
儒、佛、道的融合与程朱理学	(332)

论朱熹对儒学的继承和创新	(349)
宋明理学与书院教育	(365)
许衡哲学思想研究	(374)
论许衡对朱熹理学的继承和改造	(388)
论许衡的自然观及其折衷朱陆倾向	(395)
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	(407)
王阳明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	(413)
王阳明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开启者	(424)
试论颜元、李塨哲学思想的新因素	(429)
试论《明儒学案》	(438)
试论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与形态	(443)
试论唐甄的贵民富民思想	(455)
评康有为《大同书》的人道主义思想	(466)
洪秀全的中西文化观	(480)
《新民主主义论》哲学思想试探	(493)
论刘少奇同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504)
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514)
试用比较研究法看中外哲学史的异同	(528)
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	(542)
哲学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	(553)
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565)
改革的哲学与哲学的改革	(577)
略论改革与哲学	(585)
试论现代新儒学	(600)
文化哲学研究	(617)
论人的价值	(660)

论孔子的思想核心——“仁学”——人学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的天人之学、做人之道、人伦之德、政治之论、教育之方都是围绕着“仁”这一核心展开的，不把握孔子思想中“仁”的实质，就不能了解孔子思想的真谛。

孔子的“仁学”，就是“人学”。它是西周末年以来截天、重人思想发展的理论概括。夏、商、周以来，支配着中国思想界的是“神”，即“上帝”。地上的“皇帝”是天上的“上帝”的最高代表，人要屈服于“上帝”和“皇帝”的统治之下，成为“上帝”和“皇帝”的奴婢。在这种情况下，“上帝”的权威是不可抗拒的。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帝”具有对自然和社会发号施令的权力。如“帝令雨”（丙六一，丙三八一），“帝不令风”（丙一七），“帝其降囚（灾祸）”（乙七四五六），“帝受（授）我又（福祐）”（存一、二一九）等；它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从西周末年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的反抗斗争，天上的“上帝”和地上的“皇帝”的地位开始动摇，人民地位逐渐提高，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怨天”的思潮，把上帝置于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对立面。他们不仅怨天，而且尤人，并从对“天”的批判转而对当时统治阶级的批判。这些思想，表现出神的地位的动摇和人的地位的提高。截天、重人是西周末年以来思想发展的趋势，孔子“仁”的思想，正是这一认识发展趋势的理论概括。

“仁”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没有发现，但在《尚书》和《诗经》中已出现。《尚书》仅有一处：“予仁若考”（《金縢》），指的是一种美的品德；《诗经》有两处，一处是“洵美且仁”（《郑风·权于田》），一处是“其人美且仁”（《齐风·芦令》），此两处“仁”

都是同美家用，指的是人的美德。春秋时期，“仁”已大量出现，反映这一时期思想的《左传》和《国语》两书，已有大量的“仁”字出现。《左传》中“仁”字出现三十三次，《国语》中“仁”字出现二十四次，而且这些“仁”字往往与人联系在一起。如《国语·周语》说，“倍仁必及人”。在春秋时期，“仁”已成为人的美好品德的表现或概括。孔子正是继承这一思想而提出“仁”的学说。

“仁”在孔子以前，虽然不断地出现，但“仁”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是孔子先提出来的。在孔子那里，“仁”是理想人格，是解决人际关系的最高目标。他认为，人们只要按照“仁”的要求办事，天下就不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状况，而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他几乎把一切好的品德都归结到“仁”中去。在《论语》中，论“仁”凡一百零九次见，他针对着不同的情况，对“仁”作种种不同的解释，如说“爱人”为“仁”，“忠恕”为“仁”，“孝悌”为“仁”，“克己复礼”为“仁”，“居处，恭执敬，与人忠”为“仁”等等。对于孔子“仁”的内涵，学术界历来众论纷纭，有的人说是“爱人”，有的人说是“克己复礼”，有的人说是“忠恕”，有的人说是“孝悌”，总之，各抓一点，各执一方。我们认为，单把哪一点归结为“仁”的内涵，都不符合孔子思想的原意。孔子的“仁”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范畴，它是一切好的品行的总概括。不过，在孔子对“仁”所作的种种解释中，其中心思想是肯定人的地位，主张爱人，强调处理好人际关系。孔子在这方面的论述是很多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在这里，他明确地把“仁”说成“爱人”、“爱众”。这就肯定了人的地位，把人作为爱的对象。在此基础上，他强调处理好人际关系。他把“克己复礼”说成是“仁”的表现，是为了处理好君臣父子关系；他把“忠恕”称为

“为仁之方”，是为了处理好君臣关系和人际关系；他把“孝悌”称为“仁”，是为了处理好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他把恭、宽、信、敏、惠称为“仁”，是为了处理好人际关系，如此等等。一句话，就是强调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为什么以肯定人的地位、爱人和处理人际关系作为思想核心呢？这是因为，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敬天、重人的思想传统，又看到了在社会大转变、大动乱的时代，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紧张，从而认识到人和处理人际关系问题的重要。

孔子之所以把“仁”作为他思想的核心范畴，正是为了肯定人的地位，强调“爱人”和处理人际关系。因为“仁”字“从人从二”，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符合孔子解决人际关系的思想。孔伋（即“子思”，前483～前402年）在《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郑玄（公元127～200年）注《礼记》认为，“仁”是“相人偶”之意。孔伋和郑玄的解释，都认为孔子的“仁”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其实，在春秋时期，人与仁往往是混用的。清代朱彬指出：“《论语》‘人’‘仁’多不分。”（《经传考证·论语》，《皇清经解》第1386卷第1页）如《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宋代陈喜《扪虱新语》在注解这段话时说：“‘仁’即‘人’。”又如《论语·雍也》：“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宋代朱熹注引刘聘君的话说：“‘有仁’之‘仁’，当作‘人’。”当时其他的书也有这种情况，如《吕氏春秋·论人》：“哀之以验其人。”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诂》说：“人即仁也。”因此，我们认为，孔子用“仁”作为最高的核心范畴，就是为了突出“人”，为了强调“爱人”和处理好人际关系。将“仁”解释为“人”或“爱人”的，不仅孔子一个人。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仁”是对“人”说，它们统一起来就是“道”。“人”就是“人道”。

荀子说：“彼仁者爱人”（《荀子·议兵》），“仁，爱也”（《荀子·大略》）。认为“仁”就是“爱人”，就是“爱”。墨子说：“仁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也。”（《墨子·兼爱下》）他认为仁者必须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实际上也具有爱人之意。《墨经》说：“仁，体爱也。”认为只有爱人利物的人才能称为仁人。商鞅说：“凡仁者以爱为务”（《商君书·开塞》），把爱作为“仁”的根本。《吕氏春秋·爱类》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这是强调“仁”要以“爱人”为根本，不爱人就是不仁。我们认为，孔子提出“仁”这一范畴，就是为了肯定人的地位，突出爱人思想，强调处理好人际关系。所以，孔子的“仁学”就是“人学”。冯友兰先生说：“孔丘讲仁，是对人的反思，这种反思是人类精神的自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第147页）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孔子提出“仁学”是一个创造，是对西周末年以来神的地位动摇、人的地位提高和人际关系问题突出这一历史潮流的理论概括。“仁”这一理论范畴的提出，是我国认识发展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理论成果。

孔子的“仁”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它贯穿于他思想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方面说，他是抓住人这个中心问题，从天人、人性、人道、人生、人格、人际等方面展开。

一、天人

司马迁在写他的不朽著作《史记》时，曾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作为己任。在司马迁看来，“天人之际”问题是先秦思想家讨论的重要问题，自然也是孔子不能不讨论的问题。孔子同先秦其他思

想家一样，认为人同天道是分不开的，人之道亦即天之道。对于天，孔子采用“中庸”的观点和方法去对待：一方面，他没有摆脱西周以来的六命观，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提出“畏天命”（《季氏》）、“不怨天”（《宪问》）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把“天”理解为自然界。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在他那里，天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然而，孔子的着眼点并不是研究人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这一方面，他扬弃了西周以来“以德配天”的思想，主张通过人的努力，达到天与人的和谐，即“天人合一”。

在孔子的时代，物质生活和科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全摆脱天命的水平。他没有完全摆脱天命思想，但是他强调“力”的作用，主张修人事以应天命，做到天人和谐。这一思想，为我国认识的发展提出了“究天人之际”和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的思想路线。

二、人性

孔子从对人的地位、作用和人际关系的探讨中，进而研究人的普遍的共同本质问题，即人性问题。孔子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人性论思想，但是，他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的观点，从而开了我国人性论思想的先河。

在人性论方面，孔子没有说明人的普遍的共同本质是什么，但他指出，人的共同本质（“性”）是相近的，是由于后天的“习”（学习、环境的影响）才拉开了距离（“相远”）。这一思想，承认人生下来善恶品质是平等的，并认识到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不仅具有古代人文主义的思想因素，而且具有科学的思想因素。

孔子在人性论上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但在知

识论上又作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的论点，那么“上智”与“下愚”的性是不是“相近”呢？他们的“性”通过“习”能否“相远”？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虽然，孔子的人性论讲的是普遍的共同的道德素质，而知识论讲的是知识素质和掌握知识的能力，二者不是同一个领域，然而，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认为他的道德素质可以通过“习”而“相远”，知识素质不能通过“习”而“相远”，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思想是同“性相近”、“习相远”思想相矛盾的。这一矛盾，说明他的人性论思想不够完密。然而，孔子对人的认识还处在朦胧阶段，把理论上的探讨引向新的领域，对人的普遍的共同的本质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创见性的论述，在我国认识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三、人道

反映着当时社会大转变时期人的地位的提高，孔子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引述孔子语)。他的人道思想的基本原则，就是“人为贵”和“泛爱众”(《学而》)。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他的人道思想强调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重人事，轻天道，轻鬼神。

在天人关系上，孔子并不是不谈天，但他认为，人们所重的不应该是研究天是什么，而是研究人与天的关系，研究人怎么办，即重“人道”，而轻“天道”。他说：“所重，民、食、丧、祭”(《尧曰》)，要把人的事放在首位。他反对用活人殉葬，也反对用俑陪葬，甚至骂发明俑的人要断子绝孙。在人与鬼神的关系上，他不谈论“怪、力、乱、神”(《述而》)这四件事，他说：“敬鬼神而远之。”(《雍也》)

第二，提出了“立人”、“达人”、“勿施于人”的思想。

孔子在“人为贵”和注重人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爱人”、“爱众”的要求。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可谓仁乎？’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在这里，孔子指出“爱人”、“爱众”并不是空洞的，它必须是“博施于民”、“能济众”。自己不愿他人这样对待我，我就不要这样去对待他人。自己想建立的东西，也应该帮助别人建立。自己想达到的，也帮助别人达到。总之，就是要平等待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关心别人。

孔子的人道思想，是春秋时期社会大变革中时代精神的表现，它不仅对反对奴隶主专制主义起积极作用，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发生积极的影响。

四、人生

孔子的学说以“人”为中心。他的人生观，主要表现于人生目标、人生价值、人生态度三个方面。

（1）人生目标——志于道，仁以为己任。

建立符合“仁学”要求的“天下有道”的世界，是孔子人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他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这是说，一个人要以“道”为奋斗目标，不符合“道”的要求的衣食、富贵是不足取的。他所说的“道”也就是“仁”，“志于道”也就是志于“仁”。所以，他要求人们要“仁以为己任”。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认为弘扬仁道是人一生的最高目标，人要为它奋斗终生，做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

（2）人生的价值——立德、立功、立言。

人生的价值问题，《左传》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不朽就是永久的价值。孔子认为，人生要给后人留下永久的崇高品德，永久的辉煌业绩，永久的言语文字。他正是以这“三不朽”思想来衡量人们的行动的。

孔子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强调人生的价值在于“立”，就在于对社会作出贡献。在“三不朽”中，孔子最重视“立德”。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认为只有立德才是成功的根本。他把品德说成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3）人生态度——自强不息。

孔子认为，要志于道，仁为己任，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就必须自强不息地奋斗一生。他早年就立志于学，“学而不厌”（《述而》）。他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述而》）在学习中，他“学而时习之”（《公冶长》），“温故而知新”（《学而》），“不耻不问”（《为政》）。他一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是同他一生手不释卷地勤奋学习分不开的。在工作上他也是勤奋进取，兢兢业业，他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一生自强不息，发愤忘食地进行工作。

孔子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为后人树立了高尚的典型，为中华民族树立自信、自立、自强、自决、勤劳、勇敢、刚健、有为、进取、拼搏的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我国历

史上所产生的“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良品质，是同孔子这些思想密切联系的。

五、人格

孔子深入研究人的问题，提出了君子理想的人格设计。所谓人格，并不是指一般的伦常道德，而是从更高更深层次上对人的本质的自我认识和觉悟，是人的觉醒的一种表现。孔子的人格论，主要包括人格要素和人格修养两个方面。

孔子的人格要素，所包括的内容很多，但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1) 懂得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2) 杀身成仁。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3) 文质统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4) 见利思义。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5) 修身思亲。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第十九章)

(6) 志不可夺。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

(7) 修己安人。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忧病诸？’”（《宪问》）

(8) 忧患意识。

“不患寡而患不安。”（《季氏》）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里仁》）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议，是吾忧矣。”（《述而》）

孔子这些思想，构成了他所设计的理想人格的基本要素，其中心思想，就是掌握自己的命运，以“仁”要求自己，见义思利，修身思亲，修己安百姓。

孔子的人格修养，主要是“学道”和“躬行”两个方面，他强调“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他提出：“朝闻道夕死可也。”（《里仁》）具有捍卫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怎样去学道呢？他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这是说，必须广泛地学习而且能够坚守自己的志向，多问自己关切的问题而且能结合当前的事情进行思考，那就掌握了仁。在学习中，他既重视学，又重视思，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他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里仁》）主张向别人学习以提高自己。至于“思”，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在人格修养中，他不仅主张“学道”，而且主张“躬行”。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他对躬行是很重视的，并把它列入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论语》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学而》）孔子主张通过“学道”与“躬行”，达到人格的完善。